



论唐代制度和文化——以唐传奇中的士子和娼妓为例

**Tang Dynasty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A Study of Scholars and
Courtesans in Tang Chuanqi**

CELINE CHUAH SEE LING

蔡诗琳

21ALB04524

指导教师: 余曆雄 师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5**



论唐代制度和文化——以唐传奇中的士子和娼妓为例

**Tang Dynasty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A Study of Scholars and
Courtesans in Tang Chuanqi**

CELINE CHUAH SEE LING

蔡诗琳

21ALB04524

指导教师：余曆雄 师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5**

Copyright Statement

©2025 Celine Chuah See Ling.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5
第四节 研究难题.....	6
第二章 唐代的科举制度与风气.....	7
第一节 唐代的科举制度概述.....	7
第二节 唐代的科举考试风气.....	9
第三节 唐代士子的出身.....	10
第四节 地域差异对唐代科举的影响.....	14

第三章 唐代士子概况解析.....	16
第一节 行卷、温卷、纳卷	16
第二节 唐代士子面对的经济困境.....	17
第三节 唐代士子面对的地域困境.....	19
第四节 唐代士子科举失利后面对的困居与漂泊.....	20
第五节 唐代士子与娼妓的关系分析.....	21
第四章 唐代妓女概况解析.....	23
第一节 唐代妓女的类别与其来源.....	23
第二节 唐传奇与唐代妓女的地位对.....	25
第三节 妓女的才艺对唐代文学文化的影响.....	27
第四节 唐传奇中的妓女理想化.....	30
第五章 结语.....	32
参考书目.....	36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否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蔡诗琳 CELINE CHUAH SEE LING

学号：21ALB04524

日期：2025年9月12日

摘要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士子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显著。与此同时，都市经济的繁荣与文学文化的兴盛，也使妓女群体频繁进入文学与文化场域。士子与妓女虽身份悬殊，却在唐传奇中形成丰富的交集，二者的互动不仅构成文学作品如唐传奇等重要的叙事主题，也凸显出唐代社会的制度结构与文化。

本研究以唐传奇中的士子与妓女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唐代制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从史料与制度史出发，分析唐代士子在科举取士、经济条件与地域参差等方面的现实处境及其心态困境。其次梳理妓女群体的来源、文化功能与所处地位，揭示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特殊意义。本研究结合《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代表性文本，重点剖析士子与妓女关系的叙事模式与文化意涵。

本研究发现，唐传奇中的士子形象常与“科举失意、功名追求、异乡漂泊”相关联，而妓女则兼具才情与风尘的双重特质。两者之间的交往，反映了士人在仕途与情感之间的挣扎，这些皆展现在士子们的作品上。

本文综合运用史料文献考据与文学作品文本分析法，通过分析士子与妓女关系，旨在探讨士子与妓女、是如何与唐代的制度、文化，相互影响，又是如何影响整个唐代社会。

【关键词】唐传奇、士子、妓女、唐代科举制度、唐代社会文化

致谢

本论文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许多师长、同学与亲友的关怀与支持。在此谨向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向我的毕业论文导师余曆雄老师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从选题开始，余老师便给予我宝贵的指导，使我能够从繁杂的学术问题中明确研究方向。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余老师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帮我检查，并提出修改意见。从结构安排到论证细节，都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余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宽厚的人格魅力，不仅引领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也我在写本论文时不惧困难的深入研究。能够得到余老师的指导，是我求学经历中最幸运、最宝贵的事情。

同时，我也要感谢拉曼大学中文系的各位老师，他们在课堂教学与学术训练中给予我启发，让我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对唐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兴趣和信心。拉曼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资料资源，也为本论文的撰写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我的同学与朋友们亦给予我莫大的帮助。我特别感谢陈雨轩、余佩霖以及杨岢蕙同学。虽然我们各自都在毕业论文中研究不同的方向，但聪慧的他们常常在我遇到研究瓶颈时，给予我解决办法。尤其是擅长找资料的陈雨轩同学，提供我快速锁定研究所需的资料的办法，让我事半功倍。在论文写作的艰难阶段，他们的鼓励与陪伴，使我能够坚持下去。这友情力量，是我完成论文的重要动力。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与理解，使我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学习与研究中。他们的包容与鼓励，让我在学术的道路上始终能够保持坚定与从容。

论文虽已告一段落，但学术道路仍在延展。谨以此致谢，铭记在求学路上曾给予我无私关怀与真诚帮助的师长、同仁与亲友。

第一章 绪论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与政治高度繁荣的时期，不仅在制度上确立了较为成熟的科举取士体系，同时在文学与社会生活方面也展现出极为丰富的面貌。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得士子群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入仕经历、文学创作与精神风貌，构成了唐代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与娱乐文化的发展，妓女群体亦在社会生活与文学书写中频繁出现，并与士子群体发生了多层次的互动。在这种背景下，士人与妓女不仅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更在唐传奇等文学作品中交织出独特的叙事母题。

唐传奇作为唐代文学的典型代表，往往取材于现实生活，又融入奇幻、艳情与社会观察，其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反映了当时士子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困境。落第士子、风尘妓女常常成为唐传奇中的主要人物类型，二者之间的交往不仅折射了唐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与价值观念，也揭示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深刻互动。通过对传奇文本中士子与妓女的书写加以考察，不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唐代文学的叙事传统与审美趣味，还能从中窥见制度、经济与文化力量对个体命运的塑造。

学界对唐代科举制度、士子心态及传奇文学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如陈寅恪、钱钟书等学者多从制度史与文学史角度分析士子群体的生存处境；而傅璇琮、韩兆琦等学者则关注士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关于妓女群体的研究，则集中于她们在

都市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塑造。然而，将“士子”与“妓女”两类群体结合起来，置于唐传奇的叙事框架中加以整体考察者尚不多见。因此，从士子与妓女关系这一角度切入唐传奇的文学研究，具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本文即以唐传奇中的士子与妓女形象为研究对象，首先结合史料与制度史分析唐代士子群体的现实处境与精神特征；其次探讨妓女群体的社会来源、文化功能与文学地位；最后通过对若干代表性传奇作品的细读，揭示士子与妓女关系在叙事中的表现形式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意涵。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考证、文本细读与社会文化史结合的路径。期望通过这一研究，不仅加深对唐传奇文学特质的理解，也为唐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唐传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体之一。在唐传奇中，士子与妓女的关系是一个常见题材，这类故事往往通过士人与妓女之间的交往、爱情或冲突，展现了唐代文化背景。然而，这些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现实社会情况，仍是笔者主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唐代士人与妓女的关系不仅是文学创作中的常见题材，也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风气。科举制度中进士的兴盛，使士子地位提高，且受到文人的追捧。而娼妓则是作为伴在文人身旁的角色。娼妓与士人的交往构成了唐代文人风气的一部分。唐传奇中所塑造的士子与妓女形象，既可能折射了唐代现实的风貌。却也可能包含作者理想，毕竟唐传奇多为文人及第前所创作作品，而未当官的文人并没有钱财圈养娼妓。

所以唐传奇有关于士子与妓女的故事，也可能是来自于作者的想象，蕴含了作者渴望中举当官后的生活。

笔者在研读唐传奇时，深切感受到士子落第漂泊与妓女才情风流的交织，不仅构成了鲜明的文学画面，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性思考。正是这种现实与虚构、理想与困境之间的张力，引发了笔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愿望。

然而，唐传奇中的情节往往常带有浓厚的文学性，如前面所说，可能来自于幻想。唐代真实社会里不一定如唐传奇那般。通过研究这些作品中的士子与妓女关系，并将其与唐代史料进行对比。这种对比不仅能够帮助厘清唐传奇的文学价值，还可以探析唐代社会文化的真实样貌。

最后，当前关于唐唐传奇士子与娼妓关系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文学分析，而缺乏对文学与历史交互的全面探讨。本研究希望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唐传奇文本与历史资料，深入探讨唐代士子与娼妓关系在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关于唐代科举制度及其相关风气，已有大量研究揭示其对当时社会及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唐代科举制度作为官僚选拔的重要方式，在隋朝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以常选和制举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常选为定期科举考试，而制举则由皇帝特别设立，以应对特殊时期的人才需求。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对《新唐书》的科目分类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唐六典》和《通典》的分类更为合理，将常

选分为六类，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及明算。这些研究进一步明确了科举考试的组织形式和选拔重点。

唐代的科举风气极具特色，其中进士科尤其受推崇。王保定在《唐摭言》中提到进士的荣誉被比喻为“白衣公卿”，显示了社会对科举成功者的高度期望。然而，由于进士科录取率极低，仅少数考生能够脱颖而出，这也导致了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包括世族子弟利用权力谋取成功及寒门士子难以抗衡的现实问题。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唐传奇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唐传奇作者多为进士，其创作目的是将作品作为行卷、温卷或省卷，以提高被考官认可的机会。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解释，行卷是进士通过文学作品寻求推荐的重要手段，而温卷与省卷则是考试前的预备和展示形式。这些研究表明，唐传奇在科举风气中不仅作为文学创作的载体，更成为士人追求功名的一种工具。

最后，学界还关注到科举风气与娼妓文化的交织关系。宴会庆祝活动中娼妓的参与，既为士人提供了风流的场所，也成为唐代文人创作的灵感来源。《唐摭言》中记载的曲江宴便是典型案例，显示了科举成功后文人与娼妓互动的场景。这种文化现象反映了唐代文人与社会各阶层复杂的互动关系，对研究唐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前人研究已对唐代科举制度、妓女文化以及唐传奇文本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大多是分别展开，缺乏系统地把士子、科举、妓女与唐传奇四者联系在一起的综合性研究。学界虽注意到士子科举压力与娼妓题材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但相关成果仍零散。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唐代科举制度与士子处境，结合娼妓的社会地位

与文化功能，进一步揭示唐传奇中士子与妓女关系的文学书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从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补充与延伸。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唐传奇中士子与妓女的关系，并对比其与唐代的真实社会情况，笔者采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史料与学术成果整合分析，以兼顾文学分析与历史还原的需求。

首先，文献分析法主要从唐代文献中挖掘相关资料，包括《全唐诗》《太平广记》《新唐书》等典籍。这些文献虽然并非专注于娼妓研究，但其中涉及的士人与妓女交往的描写可以为本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在使用这些资料时，笔者特别注意辨别文献的文学性与历史性，避免直接将文学作品的虚构内容视为历史事实。

其次，比较研究法主要是为了避免单一文献视角的局限性，本研究将对比不同唐代文献的记载，以寻找相同或相似的主题，分析士人与妓女关系在当时社会中的常见模式。此外，将对唐代与其他朝代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以更全面地了解士人与妓女互动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历史演变。

最后，是史料与学术成果结合分析。笔者主要参考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等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娼妓的社会地位、来历及其职业特性。但在笔者使用这些成果时，将以唐代的社会环境为基础框架，避免完全套用后世的理论视角。同时，分析这些研究中是否存在对唐代社会的误读或过度延伸。

第四节 研究难题

本论文主要讨论唐传奇里有关娼妓的作品，如《李娃传》、《柳氏传》等，而在唐代娼妓与士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关于唐代士子与娼妓的课题，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许多研究成果从文学、社会文化等角度深入探讨了这一课题。所以，笔者在研究此课题时，遇到了必须思考如何创新角度的问题。

再者，关于唐代娼妓的研究，笔者面对了缺乏直接的官方史料支持的难题。大部分研究只能依赖唐代笔记小说和文学作品，如《太平广记》、《全唐诗》等。这些文献虽为理解唐代社会提供了娼妓的生活缩影，但其叙述带有文学性和夸张成分，难以还原历史事实。此外，笔记小说通常书写精英阶层的视角，无法充分反映娼妓作为社会个体的真实生存状况。

其次，研究唐代娼妓时，不可避免地参考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等经典论著。然而，这些研究更多是从后世视角出发分析唐代的社会现象。这种方法虽然有助于构建整体理解，但可能偏离唐代士人与娼妓关系的真实时代背景。从一千多年后的视角来看当时的情况，未免失焦。因此，笔者面对这些问题时，需要更加谨慎地平衡史料文献的使用与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的介入，避免过度依赖后世视角，尽可能还原唐代士子与妓女的真实面貌。

第二章 唐代的科举制度与风气

第一节 唐代的科举制度概述

唐传奇里其中一大主题便是士子以及妓女之前的爱恨情仇。唐传奇里有许多著名的作品，如《李娃传》、《枕中记》、《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氏传》等。这些作品皆有着两个同一的关键角色，既是士子以及妓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也皆是士子。如《李娃传》是由白行简（776—826）所著。白行简于贞元末考中进士。¹此外，《枕中记》的作者，沈既济（生卒年不详），精通于经学，受宰相杨炎提拔，召拜左拾遗、史館修撰。²再来，《莺莺传》的作者，元稹（779—831），于元和元年举制科，考中对策第一，被授官职左拾遗。³同样的，《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生卒年不详）曾担任翰林学士。⁴《柳氏传》的作者许尧佐（生卒年不详）则于贞元十年前后，进士及第。⁵根据上述所提及的例子，由此可见，写传奇的作者多是进士辈的，也就是士子。

唐代的学生要成为进士的途径是参加科举考试。而这些创作唐传奇的进士们，都有着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共同点，这与他们创作唐传奇的原因有着必然的关系。若要研究这其中的关系，必须先了解唐代的科举制度。

¹ [宋]欧阳修、宋祁等著，《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卷 119，页 2136。

² [宋]欧阳修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书》，卷 132，页 2290。

³ [宋]欧阳修，《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书》，卷 174，页 2750。

⁴ [后晋]刘昫著，《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旧唐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卷 17，页 371。

⁵ 周祖撰等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 223。

科举制源远流长，渊源于汉，起始于隋，发展于唐，变化于宋，定型于明。⁶ 所谓科举既是设“科”，“科”是指不同的考试科；“举”则是指推举的意思，目的在于获得被推荐的人才有选拔之意思，所以科举可以理解为设科取人才的意思。隋朝时期，隋文帝为了把政权收拢至中央政府，开始举行科举，用考试的方式筛选官员归从中央皇帝势力。而到了唐朝，则就沿用了隋朝的科举制，并随着时间不断地发展与改革。在科举制初始时期的隋朝成为了唐朝乃至后面几个朝代选官的核心制度。

唐代科举可以分为常选与制举。主要的分别是举办的机会的多寡。常选是会定期举办的科举考试，而制举则是皇帝争对当时的政治情况，人才的缺乏而特别设立的，是由皇帝亲定。因此制举的考试内容通常包罗万象，其中包括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内容。《新唐书·选举志》提及：“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以上可说明二者的不同。⁷《莺莺传》的作者，元稹就是在元和元年的制举中考中。

根据《新唐书·选举志》，此记载把常选的科目分为十二种，既是“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以及童子。”⁸又记载明经里包含：“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以及史科。”⁹对于《新唐书》的分类，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里提出质疑。傅璇琮先生认为同为史，却把一史、三史归为常选，史科归为明经；同样为礼，却把开元礼与三礼，分别归为常选与明经，这样并不合理。¹⁰对此傅璇琮先生认为，《唐六典》¹¹与《通典》对科目

⁶ 吴新武，〈科举源流述略及其它〉，《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页97。

⁷ [宋]欧阳修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书》，卷44，页679。

⁸ [宋]欧阳修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书》，卷44，页679。

⁹ [宋]欧阳修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书》，卷44，页679。

¹⁰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23），页25。

¹¹ [唐]李林甫等著，《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4，页109。

的分类相较于《新唐书》所记载的更明白，既同把常科分为六类：“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与明算”。¹²

唐代科举的主要应考者又分为生徒和乡贡。生徒是指从各地各类的学馆出生的学生，经过考试选拔，通过考试者则被送至尚书省参加科举。¹³乡贡则是指那些不出生于学馆的学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¹⁴乡贡必须经过多层考试，并以此从众多考生中筛选人才。乡贡的顺序，由县考试开始，再来进阶至州、府的考试。¹⁵通过州、府的考试后，就会和生徒一起参加尚书省的考试。¹⁶

第二节 唐代的科举考试风气

上一节提及的科举制度，在种种类别的科举考试科目中，进士是最为受重视。这点在各个作品中可体会出，更有不同的文学作品都有对其的赞美。王保定在《唐摭言》提到：“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¹⁷所谓“白衣公卿”，白衣通常指平民或没有官职的身份，而“公卿”则是泛指高官。再所谓“一品白衫”，一品是官员的最高品级，而白衫同样的则指未有官职的布衣百姓。还未考取功名，且只是一名平民百姓，就因为参与进士考试，就被寄予了加官晋爵的

¹²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 26。

¹³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 44。

¹⁴ [宋]欧阳修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书》，卷 44，页 682。

¹⁵ [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赠张童子序〉，《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4，页 249。

¹⁶ [唐]韩愈，〈赠张童子序〉，卷四，页 249。

¹⁷ [五代]王定保著、陶绍清校证，〈散序进士〉，《唐摭言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21），卷 1，页 14。

厚望。¹⁸再者，中唐诗人姚合也在《寄陕府内兄郭岡端公》中赞美道：“蹇钝无大计，酷嗜进士名。……春榜四散飞，数日遍八纮。”¹⁹，可见唐代对考进士的推崇。

然而虽然唐代的学者都推崇进士，但真正能通过考进士中举的考生，比起参与考试的人数，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由于唐传奇代表作的作者如白行简、许尧佐等人皆是中唐时期的进士，这里且论中唐时期的及第情况。韩愈《送权秀才序》：“余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²⁰唐朝的进士及第者在开元以后，人数大约在三十人上下，在这三十人中，一部分还是官僚大族出身的子弟。²¹虽说唐朝贞元以来，科举的目的是为了广纳人才，摆脱世族手握权力的情况，所以才出现了乡贡这一类的出身平民或寒门的考生。

但是也就如同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一般，摆脱不了，世族子弟想要获得更多权力，从而相互扶持相互包庇，乃至排外的情况。所以就会出现了依仗权势地位，行贿等手段获得及第。基本上，除去才能，清贫的士子，可以说是没有能力与官僚大族的子弟对抗的。再加之，就算进士及第后，也依然不能立即授官职，仍然必须经过吏部试，方可正式授予官职。而及第后，却过不了吏部试的，大有人在。这让清贫的士子，距离出人头地，步入仕途，又多了一个难关。

第三节 唐代士子的出身

¹⁸ 苟煜，〈唐代科举制度与唐传奇的关系浅论〉，《今古文创》2024 年第七期，页 37。

¹⁹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 497，页 5646。

²⁰ [唐]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送权秀才序〉，《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4，页 276。

²¹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 244。

唐代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中进士科的影响尤为深远。进士及第不仅意味着仕途的开启，更象征着社会地位的跃升。这使得进士科逐渐成为各类社会阶层人士共同竞争的重要舞台。

唐代入仕途径大致有三，即是门荫、流外入流和科举。就数量而言，科举取士的人数远不及门荫与流外。然而，就对社会的影响力而言，科举则远超其他途径。根据《登科记考》的记载，唐代前期每年登第的进士仅十余人，加上明经科，总数也不过百余。²²但随着时间推移，进士出身逐渐成为中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至德宗贞元以后，进士科稳定地掌握了通往高位的通道，宰相和高级官员多出自进士，门荫与流外出身反而日渐边缘化。²³

正因如此，唐人普遍将进士比作“登龙门”，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韩愈在《上宰相书》中直言“不由吏部而仕进者几希矣”²⁴，这表明了越到后期唐代进士的被重视程度，成为了想要入仕者最好的途径。唐代进士科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涵盖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弟。进士不再是士族门阀的专利，社会各阶层人士皆有可能通过此途径入仕。可以说无论出身如何，唯有通过进士考试，方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与手握社会影响力。

因此，唐代士子的出身背景并不单一。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对其来源进行了梳理，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七类。首先是出身县吏者。县吏作为基层官僚，社会地位低微。然而唐代不乏县吏子弟发愤读书，最终登第的例子。根据《旧唐书》记载，元和二年，朝廷下令禁止县吏应举。²⁵然而实际效果却有限，仍有县吏子弟

²²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 205。

²³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 206。

²⁴ [唐]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上宰相书〉，《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3，页 157。

²⁵ [后晋]刘昫，《欽定四库全书荟要·旧唐书》，卷 14，页 309。

及第入仕。如《唐摭言》记载一个人物——湛贲。湛贲本为江西宜春小吏，受妻族激励后奋发向学，最终于贞元十二年与孟郊等同登进士第。²⁶又如《太平广记》记载一位名为汪遵的县吏亦是从小吏身份转而登科。²⁷这一现象表明，科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僚身份的藩篱，为社会下层提供了上升通道。

其二，是出身工商市井之家得士子。唐代工商业繁荣，市井子弟亦通过进士科跻身仕途。根据《北梦琐言》记载，一位出身于酒家的陈会，后官至刺史。²⁸又如裴庭裕的《东观奏记》记载道，毕誠为盐商之子，终位宰相。²⁹这种情况在隋以前几乎不可想象，而在唐代，随着市民阶层经济地位的上升，其政治诉求亦逐渐获得承认。

其三，是出身僧道者。僧道出身亦能还俗应举，他们或因失意而出家，或因际遇而还俗，但最终仍能凭借诗文才学登第。如《唐摭言》所记载的刘轲，少为僧，后而进士登第。³⁰也有出身道士的，如《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吉中孚，始为道士，后官校书郎。³¹这说明唐代科举制度在身份限制上较为宽松，宗教出身并未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

其四，出身节镇将校之家者。如关图，本为节镇属下将校之子，及第后乡里大宴庆贺。³²虽然其父辈地位不高，但通过进士科，其子弟依然可以实现身份的跨越，即便出身军伍，也能凭文才步入仕途。

²⁶ [五代]王定保著、陶绍清校证，〈以贤妻激劝而得者〉，《唐摭言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21），卷8，页332。

²⁷ [宋]李昉等著，《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183，页1363。

²⁸ [宋]孙光宪著、朱以安、傅璇琮、周常林、戴建国等编，〈北梦琐言〉，《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卷3，页40。

²⁹ [唐]裴庭裕著、田廷柱点校，《东观奏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130。

³⁰ [五代]王定保著、陶绍清校证，〈反初及第〉，《唐摭言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21），卷11，页473。

³¹ [宋]欧阳修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书》，卷60，页904。

³²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4，页50。

其五为幕府从事再登科举者。不少文士先在方镇幕府任职，再借资装赴京应试。如李商隐便曾依附令狐楚幕府，后登进士第。³³此类人往往家世寒微，但通过幕府的资助获得机会，显示出地方政治势力对科举的影响力。

其六为外国籍应进士举者。唐代开放的国际环境，使得外国人也能参加进士科。在宣宗大中二年（848），有一位来自大食国的士人李彦昇，在宣武军节度使卢钧的荐奏之下，成功登第进士。³⁴他们不仅登科，还与中原士人交往甚密，甚至留下值得研究的作品。如朝鲜人崔致远，留下的《桂苑笔耕集》。

最后是出身贫寒士人。贫寒士人是唐代进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缺乏经济支持，科举之路尤为艰难。如王建、张籍、孙樵、陈季卿、公乘亿等人，都曾在诗文中记述自己困顿求仕的经历。长安应举者常常“空囊落拓”，甚至卖身度日。尽管如此，他们仍不懈努力，终于或早或晚登科。这一阶层的进士最能体现科举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力。这一种类也是唐传奇常出现的士子类型，如《霍小玉传》里，霍小玉在经济上支持李益。

进士科打破了门阀垄断，使各阶层优秀人才有机会进入政坛。这不仅增加了政治阶层的多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世族势力，巩固了皇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唐代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无论县吏、盐商、僧人还是贫士，都以进士为人生目标。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使进士科成为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龙门”。而进士考试注重诗赋，这直接促进了唐代文学的昌盛。孟郊、贾岛、罗隐等大量出身寒微的进士，正是唐诗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不同阶层士人的加入，也使唐代文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貌。

³³ [后晋]刘昫，《欽定四庫全書·舊唐書》，卷 190，页 3292。

³⁴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 215。

第四节 地域差异对唐代科举的影响

中唐以后，进士科举的广泛性也表现在地域分布上。唐玄宗开元年间，朝廷规定各州贡士人数：上州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虽然制度上也补充说“只要有才德，不设人数限制”，但实际操作中，上、中、下州的名额仍有差异。³⁵这说明各州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一些偏远地区不仅推荐人数少，录取也更困难。到了武宗会昌五年，制度更为细化，例如东都国子监及关中地区的州郡，每年最多可送三十人应进士，而江南、浙西、浙东等地则限十五人，更远的岭南、安南等地只有七人。³⁶这些名额分配，反映出地区差距对科举机会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某些边缘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渐发展，应试人数和录取情况渐趋与中原接近。

以福州为例，《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唐天宝年间，福州下辖八个县，户三万四千八十四，口七万五千八百七十六。³⁷但在中唐以前，本地士人多安于一隅，不愿北上求仕，教育风气也落后。据《新唐书》记载，常衮担任福建观察使后，兴办乡学，鼓励士人作文，并亲自指导，使当地文风转变，贡士数量逐渐与内地相当。³⁸虽然传记中或有溢美成分，但从史实来看，福建自欧阳詹登第后，连年有人及第，逐渐形成士人群体，与中原士子相抗衡。

³⁵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 218。

³⁶ [五代] 王定保著、陶绍清校证，〈会昌五年举格节文〉，《唐摭言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21），卷1，页 6。

³⁷ [后晋] 刘昫，《欽定四库全书荟要·旧唐书》，卷 40，页 1036。

³⁸ [宋] 欧阳修等，《欽定四库全书荟要·唐书》，卷 203，页 3110。

荆南、江西的情况亦类似。《北梦琐言》记载，荆州解送举人往往无人中第，因而有“天荒解”之称。³⁹直到大中年间，刘蜕等人登科，才打破僵局。他在书信中自述，家境贫困、路途遥远，每年只能在长安短暂停留，求学与应试极为艰难。江西的卢肇则因出身边地，初举时还遭人讥讽，说“袁州出举人犹如江中出现九肋龟般罕见”。⁴⁰尽管如此，他仍在会昌年间及第。

岭南地区更为偏远，人才出仕更少。但到晚唐，桂阳人曹邺于大中年间登第，成为该地首位有文献可考的进士。⁴¹他出身贫寒，作诗多写求学与生计困境，即使登第后，仍要赡养寡嫂孤侄，生活拮据。同一时期，桂州还有赵观文等人陆续中第，其中赵观文更在乾宁二年高中状元。⁴²

总体而言，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频仍，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江南及岭南地区逐步涌现进士。这些新兴地区的举人多出身寒微，本地原本也不算文化中心，但到中晚唐已能与中原竞争。

³⁹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4，页50。

⁴⁰ [五代]王定保著、陶绍清校证，〈自负〉，《唐摭言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21），卷12，页539。

⁴¹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593，页6874。

⁴² [宋]孔平仲著、朱以安、傅璇琮、周常林、戴建国等编，〈珩璜新论〉，《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卷3，页262。

第三章 唐代士子概况解析

第一节 行卷、温卷、纳卷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对于唐传奇小说的评价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⁴³所谓“有意为小说”，是指作者有着明确以文学创作为目的而创作的小说。而就如第一章所提到，唐传奇的作者皆乃进士辈。鲁迅又《中国小说史略》提到：“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⁴⁴对于唐传奇的创作大多目的为及第前或授予官职前的行卷、温卷与省卷。

首先，先谈行卷。所谓行卷，根据程千帆于《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它的解释，是指应试者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写成卷轴，呈现给当时不论是社会、政治或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推荐给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⁴⁵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自己及第的机会。接上一章所言，进士及第并非容易的事。根据《唐会要》记载，德宗贞元十八年五月，皇帝下令每年考试所取人数，明经必须少于一百人，进士必须少于二十人，若无其人，不必要补此数。⁴⁶而唐时对进士科的追捧，每年至少一千余人的应试者，这少于二十人的规定，又把进士及第的难度提升。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记载道：“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⁴⁷这里所谓的举

⁴³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香港：三联书店，1996），页72。

⁴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页72。

⁴⁵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页380。

⁴⁶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76，页1639。

⁴⁷ [宋]赵彦卫著、张国星校点，《云麓漫钞》（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卷8，页82。

人是指士子。而就如其所言，唐传奇就是作者们行卷的手段之一。目的为了在考试前增加自己的名气，争取在自己的名字被主司官所熟知。《云麓漫钞》又记载道：“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⁴⁸所谓温卷其实就是应试者们在第一次行卷后，又反复呈送于达官贵人们，这种行为就叫“温卷”，目的在于反复提醒这些达官贵人并且向其反复展露自己的才华，以便获得其推荐。且唐时并没有实行糊名制，主司官与主试者是可以知道是来自哪个考生的考卷。所以应试者们行卷，若得到名人的推荐，是可以影响主考官的判断的。所以这行卷，不妨也是有才华的清贫学生，可以以才华对抗权贵子弟的手段。

其次，再来谈谈省卷。所谓省卷，程千帆先生指出省卷是进士到礼部应试前，除了投行卷于达官贵人外，还要向主司官纳省卷。⁴⁹也就是说除了向达官贵人投行卷，以获得推荐之外，还会需要按规定给礼部纳省卷。傅璇琮先生则认为这其实算是正式考试前预考试。⁵⁰然而省卷与行卷温卷的差别，是省卷是出于规定，而行卷温卷则是由应试者自己的自由，不规定一定要投。然而，不同于行卷温卷题材文体可以自由发挥，省卷的要求严格必须有关于经济，不能允许虚妄怪诞之作。⁵¹以此可以下定论，唐传奇必定是出自于行卷温卷之作，而非省卷之作。

第二节 唐代士子面对的经济困境

唐代科举制度虽为士人提供了由下而上的晋升渠道，但其运行过程中，地域条件与经济基础始终是决定士子命运的重要因素。地域距离的远近、经济负担的轻重，

⁴⁸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页82。

⁴⁹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页384。

⁵⁰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264。

⁵¹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270。

不仅影响士子赴京应举的机会，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士子的文学心态与表达。通过对唐人诗文、笔记乃至唐传奇作品的考察，可以清晰看到科举之路背后所隐藏的地域不平等与经济压力。

长安作为大唐帝国的都城，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地位无可动摇。然而，读书人若要在长安停留数年以备科举，则必然面临巨大的经济负担。白居易初入长安时，顾况曾以“长安居大不易”戏语相迎，这道出了当时士人普遍的切身体会。⁵²由于皇室、勋戚、权贵、豪族、商贾等群体聚居于此，导致长安的生活费用远超其他地方。对于出身地主家庭甚至自耕农的读书人而言，一旦屡试不第，则衣食费用往往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例如，晚唐诗人曹邺的《下第寄知己》提到：“举头望青天。白日头上没。归来通济里。开户山鼠出。”生动刻画了士人寄居长安南城的困顿处境。⁵³他以野鼠、薇蕨等意象烘托出家徒四壁、饥寒交迫的生活状态。又例如，散文家孙樵亦记述自己在长安十年间“粹如冻灰，癯如槁柴”，白日饥饿到眼花昏黑，夜里又因缺衣少被而冻得彻骨。⁵⁴孙樵的描述揭示了贫寒士子在长安长期滞留的真实困境。

这种饥寒与困顿，也成为唐传奇创作的潜在背景。例如《李娃传》中的裴生，正是落魄困居长安的士子代表。⁵⁵他因屡试不第、经济拮据而陷入迷惘，其遭遇与现实中无数失意士子形成对应。传奇作者通过文学塑造，将现实的寒士困境转化为故事情节，让士人群体的焦虑与无奈得以文学化表达。

⁵²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357。

⁵³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592，页6868。

⁵⁴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358。

⁵⁵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484，页3985。

第三节 唐代士子面对的地域困境

唐代地域辽阔，南北差距明显。对于江南、岭南、福建等地的士人而言，赴长安应试是一段极为艰辛的旅程。刘蜕在《上礼部裴侍郎书》提到：“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⁵⁶，由此可见南方士子每年往返京城几乎耗费半载时光，加之疾病、风雨等不可控因素，更令旅途艰苦不堪，也是这种漫长归途的真实写照。种地域上的不平等，使得南方士子在应试过程中不仅要面对才学竞争，还要承受更高的经济与体力成本。相较之下，关中、河北等地的士子因地近京城，往返便利，所耗财力与精力远低于南方同侪。这种不均在无形中加剧了地域间的差距，也成为影响士子仕途的重要因素。

唐传奇也把有应考者需要长途跋涉前往长安考试的现象作为背景。例如李朝威所写《柳毅》中，男主角柳毅赴京城长安考试，却落榜后，打算回到自己的家乡湘江。⁵⁷途中因际遇而与龙女结缘，其从“漂泊”到“奇遇”再到升华成为神仙。⁵⁸作者借助这种美好的幻想，幻想在长远的回乡之路会有美好的奇遇，既保留了地域艰辛的现实背景，又借助幻想化的叙事为士人提供一种精神补偿。

经济困境与地域不便共同造成了许多士人的悲剧。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唐曹因墓铭》，直白的记录了一位“三举不第”的士人，终困死于长安道上的遭遇。⁵⁹这些记载虽零碎，却真实反映了唐代下层士子因经济与地域压力而葬送一生的事实。韩愈在《与李翱书》中提到：“赴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⁶⁰，字

⁵⁶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362。

⁵⁷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419，页3410。

⁵⁸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419，页3410。

⁵⁹ [宋]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唐曹因墓铭〉，《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2，页848。

⁶⁰ [唐]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与李翱书〉，《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3，页178。

里行间皆是士人因久困长安而走投无路的血泪。士人科举之路的艰辛，不仅体现在考场成败，更体现在背后的经济与地域代价。

唐传奇对这种悲剧性也进行了加工与放大。霍小玉、裴生、张生等人物的爱情与命运，往往因门第、经济、身份的差异而走向悲剧。他们的结局虽是文学虚构，但其中映射的正是落第士子普遍面对的困境，即功名无着、经济拮据、社会边缘化。所以，唐代科举虽具有一定的公平性，但地域与经济因素却构成了现实的门槛。长安的高昂消费使士子们难以久居，南方士子的长途跋涉则加重了他们的经济与体力负担。

第四节 唐代士子科举失利后面对的困居与漂泊

上两节提到，唐代士子在应考科举的路上会面对经济与地域两大困境。所以唐代士子在长安的经历往往因考试失利而转向两种状态，即困居与漂泊。困居者多滞留京城，继续攻读，然心境却日渐抑郁。豆卢复在《落第归乡留别长安主人》诗中写“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⁶¹，表现了士人落第后既无颜久居，又难以轻易归乡的尴尬境地。孟郊在《再下第》中写“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⁶²，更体现士子在长安困居时的孤苦与乡愁。

漂泊者则多在放榜后外出游历，以求地方官员、名士的推荐与资助，或回乡瞻亲。刘蜕在《上礼部裴侍郎书》中提到“家在江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一岁之中，独余一月在长安”，其余大半时间皆耗费于往返旅途与乞假求助之中。⁶³这种“行役”的艰辛，既消耗了士人的体力与青春，也让他们的人生几乎被科举制度所完全吞噬。

⁶¹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 203，页 2123。

⁶² [唐]孟郊，〈再下第〉，《孟东野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卷 3，页 7。

⁶³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 362。

这种困居与漂泊的心态，也在唐传奇中留下痕迹。许多传奇人物的身份设定，即是落第士子或漂泊书生，他们因科举失意而与都市、爱情、奇遇发生联系。如《莺莺传》中的张生，他虽才情出众，却因身份卑微与仕途不畅而显得漂泊无依。⁶⁴传奇通过这些文学形象，显示出士子在现实中的困境，让“落第”“漂泊”成为作品中反复提及的主题。

第五节 唐代士子与娼妓的关系分析

唐传奇中有关于士子与娼妓的篇章，虽有添加文学色彩，如对情节的编排与人物的塑造等，但却是也折射了唐时的真实风气。首先，对于士子与娼妓关系，可以从唐时的科举风气来看。就如第二章所提，唐代科举兴盛，其中进士科更是受文人的追捧。《唐语林》记载薛元超说道：“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⁶⁵，可见进士科受到的追捧。唐人对于进士科的重视，就导致进士及第后的文人，有着较高的地位，出尽了风头。

文人进士及第后的文人，一时受万众瞩目。在拜谒座主与宰相以谢恩并攀关系后，就是参加许多的宴会了。关于宴会的记载，《唐摭言》提及了许多宴名，如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与关宴。⁶⁶其中闻喜宴就是曲江宴的一种，或曲江宴又称关宴。曲江宴是新及第进士最重要也是最风光的宴会，是放榜后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庆祝宴会，设于曲江，故称曲江宴或曲江大会。

参考《唐摭言》，曲江宴时，首先会派人通知教坊准备奏乐，皇帝则登上紫云

⁶⁴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 488，页 4012。

⁶⁵ [宋]王谠著、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 4，页 384。

⁶⁶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校证》，卷 3，页 91。

楼，在垂帘后观看。⁶⁷这里的教坊就指入乐籍的娼妓的隶属机构。再者，《唐摭言》亦载到：“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阙一则罚金。”⁶⁸大会开始后，人们会带着随身的被袋，袋中通常装有画屏、酒具、钱币和丝绢等物品，边赏花边饮酒。而这些被袋的检查由状元和录事共同负责，如果少了一样物品，就要罚款。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道：“苏叔党政和中至东都，见妓称‘錄事’……”⁶⁹，所以这里的录事其实是指妓子。这就使士子狎妓游宴，就如奉旨一样。

这些宴会因为多需要妓子的歌舞表演助兴，可以说这些妓子是宴会中的必要角色，而这些庆祝及第的宴会又是未及第文人的向往，所以与妓子的风花雪月歌舞作伴，可能成为他们的幻想，并成为创作题材。再者，当时狎妓文化兴盛，是地位名利的象征。唐代文人大多自诩风流，与娼妓的风花雪月是他们所流行的文化。《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道：“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⁷⁰且妓子多有才能，由于诗赋的流行，他们基本除了歌舞外，还能与文人相对对诗。所以与妓子风花雪月，往往也被文人们享受着，且当作流行那般追捧着。

⁶⁷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校证》，卷3，页83。

⁶⁸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校证》，卷3，页83。

⁶⁹ [宋]陆游著、李剑雄等校点，《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6，页82。

⁷⁰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25。

第四章 唐代妓女概况解析

第一节 唐代妓女的类别与其来源

根据王书奴先生所著的《中国娼妓史》，先生把从中国殷商时期至民国以后时期的娼妓历史分为五大期。既第一期，殷代至商代灭亡时期（公元前 1783 年至公元前 1123 年）；第二期，西周起至东汉灭亡时期（公元前 1122 年至公元 219 年）；第三期，三国起至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灭亡时期（公元 220 年至公元 617 年）；第四期，唐起至明灭其中包括宋元朝代（公元六一八年至一六四三年）；第五期，清朝开国以后（一六四四年以后）。王书奴先生把第四期也就是唐宋元明四朝时期称为：“官妓鼎盛时期”。唐代娼妓皆入乐籍，先隶太常，后来属教坊，而管辖则为乐营。⁷¹

宫妓，是由天子独自享受的。比如《开元遗事》卷四记载到：“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馀人……。”⁷²又比如《开元遗事》卷二记载到：“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苦寒之际，使宫妓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自呼为‘妓围’。”⁷³这些事迹，皆证实了宫妓的存在。其来源有二，一是罪人之女入宫，二是掠夺平女。⁷⁴第一种，是由于家族成为罪人而没落，被充入后宫为宫妓。如《新唐书》记载道：“上

⁷¹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上海书店，1991），页 74。

⁷² [五代]王仁裕，《开元遗事》，页 38。

⁷³ [五代]王仁裕，《开元遗事》，页 25。

⁷⁴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页 71。

官仪及子庭芝被诛，庭芝妻郑及女婉儿配入掖庭。”⁷⁵第二种，则是因为才艺或姿色过人，而被天子招入宫为宫妓。比如明皇宠爱的宫妓许永新，本是吉州永新乐籍，以善歌，开元末选入宫。⁷⁶

官妓，是由天子以外的官臣所可以享受的娼妓，大多与文人有联系。比如《唐语林》卷七提到杜牧依仗自己的才华和名气，颇追求声色，他自夸自己有鉴别与鉴赏声色的能力。⁷⁷听闻吴兴郡有佳色，卸任宛陵幕职后，前往吴兴郡，显然是为了亲自一睹“佳色”的风采。⁷⁸吴兴郡的太守听说杜牧对“佳色”的兴趣，对杜牧的到访表现出相当重视并以礼相待。⁷⁹根据这个事迹所记载，杜牧需要拜访吴兴郡太守才得以见到“佳色”，也就是说这“佳色”是妥妥一名养在太守府，主要服务臣庶弟子的“官妓”。除此之外，《唐语林》卷二也提及了官妓。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白居易与两位旧相识——吴兴的太守钱徽与吴郡的太守的李穰，日日吟诗作对、饮酒抒怀。助兴并服务于这些文人的有两位官妓，既是巧于应对并善歌舞的高玲珑和谢好好。

这些官妓的身份来源比起宫妓，通常是身份较低贱的民或奴隶。王书奴先生把官妓的来源分为三种，既是来源于买卖、误坠风尘以及罪人家小籍没。⁸⁰所谓买卖既是人口买卖，《唐律疏议》载道：“奴婢贱人律比畜产。”⁸¹。唐时，娼妓的地位等同于奴婢，所以是有如主人的个人资产，是可以进行买卖的。其次，关于误入风尘的说法，王书奴引《北里志》记载道：“诸女……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

⁷⁵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页72。

⁷⁶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页72。

⁷⁷ [宋] 王谠，《唐语林校证》，卷7，页624。

⁷⁸ [宋] 王谠，《唐语林校证》，卷7，页624。

⁷⁹ [宋] 王谠，《唐语林校证》，卷7，页624。

⁸⁰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页72。

⁸¹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4，页332。

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⁸²其中也记载道，有些女子自幼乞讨或者家里平穷，被邀请去别人家中做客，一开始以亲情优待，过了一些时日后，逼她们学习歌舞才艺，最后逼她们去伺候宾客。⁸³最后，是罪人家小籍没，是指家里犯了罪导致家中老小的良籍被抹去，女子就入了乐籍，基本与宫妓的来源相似，唯一不同是宫妓入乐籍前是来自富贵权势人家。

第二节 唐传奇与唐代妓女的地位对比

基本上娼妓的阶级低于良民，这点从唐时对于婚姻的法律可证明。《唐律疏议·户婚律》记载道：“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⁸⁴入了乐籍的女子是无法正常结婚，嫁给良民的。唐律规定乐户的嫁娶只能发生于乐户男女之间，若嫁娶良民，则就是违背了法律，必须改正。代表着他们并不能私自通过嫁娶改变乐户的身份，只能世代为乐籍然而这也无法改变的现实。《唐律疏议》又记载道：“太常音声人，依令婚同百姓，其有杂作婚姻者，并准良人。”⁸⁵若本是良民且家中无罪人，则可以与良民结婚。但这却也不是可以由娼妓自由做主的。官妓与营妓要嫁给良人为妻妾，是必须经过管辖之人的批准，才能从良嫁人。⁸⁶以此来看，唐代娼妓的地位极低，就连嫁娶都处处受限制。

唐传奇中士子与娼妓的故事，基本上完美展现了女子的低微地位。唐传奇代表

⁸²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页 73。

⁸³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页 73。

⁸⁴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 14，页 1067。

⁸⁵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 14，页 1067。

⁸⁶ 顾宇，《唐传奇婢女妓女形象研究》（江苏：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页 14。

作品如《李娃传》、《霍小玉传》、《柳氏传》不论结局是喜或悲，那个凄惨的角色永远是妓子而不是士子。首先以悲剧《霍小玉传》为例。《霍小玉传》是文人李益与妓子霍小玉的爱情悲剧。⁸⁷李益家世清高，年轻时已有才气和风流才情，期待得到佳偶。长安有个名噪一时的媒婆鲍十一娘，深知贵人消息，为李益寻觅合适的佳偶。鲍十一娘提到霍小玉是从小霍王的小女儿，因为家族变故而改姓郑氏，过着隐居生活。妓子霍小玉才艺双绝，美貌与情趣高雅，适合与李益结合。李益与霍小玉逐渐深情相许。霍小玉因身份低贱，担心李益会抛弃她，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不安。李益对霍小玉许下承诺，生死相随，坚定不移。

后来，李益因考取拔萃科登科，被任命为郑县主簿，计划前往东都洛阳探亲报喜。霍小玉知道自己配不上当了官的李益，所以要求李益再给她一些相处的时间，结束了就让李益走。但李益却直接与富贵人家卢氏订婚，并对霍小玉避而不见。霍小玉感到失望随即病倒。后来豪侠邀请李益去游玩，路过胜业坊，小玉家突然发现李益到来。霍小玉得知李益的消息后，情绪复杂，病重加剧，最终含恨而死。死后，化成了厉鬼报复了李益。霍小玉明明是才艺双绝，外貌绝美的妓子，甚至是从小霍王的小女儿。后来却因为一个文人，辛苦供他考试，却在其中举后，遭到无情背叛。从一个美貌与才艺双全的女子，成为了恐怖的厉鬼。

再看结局圆满的《李娃传》。⁸⁸李娃被描述为一位绝色美女，以优雅和魅力而闻名，在她那个时代无人能及。在遇到郑胜之前，李娃被许多贵族家庭追求，她是受欢迎且受追捧的，表明她作为妓女的高地位。且符合角色的是，她选择客人的条件是基于男性的地位和财富，反映了她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妓女生活的务实选择。

⁸⁷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7，页4006。

⁸⁸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4，页3985。

李娃严格遵守职业规范，利用她的魅力和技巧吸引富有的顾客。郑胜是一位有志于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他对李娃一见钟情。李娃最初将她与郑胜的关系视为妓女与顾客关系的典型交易。但随着郑生花光了所有的钱，李娃的态度也冷淡了下来，她配合了老鸨策划的赶走郑生的计划。郑生被赶出门，过上了乞讨的穷日子，父亲也与他断绝关系，严厉地把他赶了出去。此时作者设计李娃后来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的情节。她开始帮助郑生，照顾他。

直到郑生在科举考试中中举了，李娃的理性再次战胜了她的情感欲望。她建议郑胜找一个更合适的对象，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的低地位与郑胜家庭的高地位格格不入。虽然最后她被封为了汧国夫人，但这是需要她用约束自己，委屈自己换来的。她是用对郑胜无微不至的照顾，委屈求全的孝敬公婆，才换来社会的认同。明明一开始，李娃虽然需要出卖身体技艺，但却也是财富美貌双收的。作者却安排其为郑胜苦苦付出，后来甚至因为身份阶级的差距而选择离开。这就是唐代社会对娼妓的打压，甚至妓子本人也受到了思想束缚，认为自己合该只付出不求回报，再次映射娼妓无人权的低微地位。

第三节 妓女的才艺对唐代文学文化的影响

唐朝社会繁华，且因为人们都崇尚科举，可以说是到处都充满读书人的时代，再加上唐朝风气较为开放，自然文学文化方面都十分的丰富。而娼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只是陪玩陪喝那么简单。大部分娼妓都掌握了唱歌、跳舞、写诗等能力。这些能力是当时上流文化或者文人雅士们人互相交流的一部分。根据《云溪友议》的记载，“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

⁸⁹，可见大诗人、官员们等文人雅士聚在一起时，都离不开这些娼妓的出席。她们的才艺不是仅仅的助兴表演，而是与文人士子的交流、审美，甚至与宫廷的礼乐制度都息息相关，甚至皆交织在一起成，相互影响。

首先，娼妓们大多精通歌舞。唐代宫廷设有教坊，专门培养乐工和歌妓，这些歌舞技能后来也传到民间，酒肆和私宴都请她们表演。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代音乐融合了胡汉风格，比如《破阵舞》是杂以龟兹之乐，而《庆善舞》独用西凉乐，二者皆是西域之乐。⁹⁰其中又记载到：“《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钟磬，以享郊庙。……其馀总谓之坐部伎。”，配着“杂以龟兹之乐”以及“西凉乐”等西域之乐的舞蹈被用在宫廷仪式中，说明唐代音乐表演中有汉族与外来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合。⁹¹而这些负责表演的乐妓就是自然成为融合这些歌舞的人。

其次，有些妓女文化水平很高，能够直接和文人吟诗唱和、流利的交流。这一现象在唐传奇与诗歌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举个例子，白居易写的《琵琶引并序》里那个来自长安的艺妓，不仅琴艺好，被白居易称赞为如听仙乐。⁹²她还能和白居易从善如流的与白居易倾诉自己的悲惨遭遇，变成白居易的创作灵感写下这首诗。⁹³

她们的才艺已经不只是助兴了，与文人的关系也不只是陪酒，经常是通过写诗等来回互动，展现出娼妓们的文化修养。比如《霍小玉传》里的霍小玉，文中提起她“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又提她本就才思敏捷提笔便成章，提笔就马上把与李益的誓言写出来，足以说明霍小玉除了歌乐与琴技，也是个善读书写字的人。⁹⁴在真实历

⁸⁹ [唐]范摅，《云溪友议》(台北：广文书局，1971)，页176。

⁹⁰ [后晋]刘昫，《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旧唐书》，卷29，页737。

⁹¹ [后晋]刘昫，《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旧唐书》，卷29，页737。

⁹²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435，页4821。

⁹³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435，页4821。

⁹⁴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7，页4008。

史中存在的人物，晚唐名妓薛涛，一名成都乐妓。⁹⁵根据《唐才子传》记载，元和年间，文学家元稹访蜀，在见过薛涛后，在升为翰林学士时写诗给她，赞美薛涛的谈吐像鹦鹉一样灵巧，章好似得了凤凰的羽毛。⁹⁶甚至推荐薛涛成为校书郎，后来蜀人把妓女称为“校书”，就是因薛涛而起。薛涛不仅参与文人雅集，还自制“薛涛笺”，成为文人写诗的重要纸具。⁹⁷薛涛的诗词作品，如《送友人》、《春望词四首》等至今留存，充分说明娼妓在唐代已经具备了可以与文人媲美的文学修养。

另外，从传播文化的角度看，妓女就像是“艺术中介”。因为科举考试，大批读书人聚集在首都赴考或等当官，闲着没事就常和妓女交往。通过一起喝酒写诗、欣赏艺术，妓女不知不觉中就成了文人审美的代言人和传播者。她们唱的歌跳的舞，不仅在民间和官办机构里流行，还通过被写进诗里小说里，变得更有名、传得更远。在唐传奇里，妓女的才华经常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作者写她们能诗善舞，不只是为了让人物有魅力，也是为了让故事能发展下去。比如《霍小玉传》里，开篇就提到出身名门的李益自幼有才华，十分自负，想娶一个佳人，四处寻找名妓。⁹⁸因此在听闻容貌艳丽，精通各个才艺又聪慧的霍小玉时，马上迫不及待地去见霍小玉，开启了整篇故事。在故事里，才艺不是摆设，直接和人物的命运绑在一起，若霍小玉并没有此等容貌和才艺，想必也不会引起李益的兴趣，也不会有后续的发展。

所以，唐代妓女们既是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创作者。虽然社会上看不起她们的身份，但她们的文化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妓女的才华不只是用来温饱的手艺，更是那个时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证明。她们通过自己的艺术本事打进了文人的圈子，让

⁹⁵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6，页103。

⁹⁶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6，页104。

⁹⁷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6，页107。

⁹⁸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7，页4006。

自身的形象跳出了“低贱”的世俗偏见，成了文化的承载者和文学的灵感来源，也影响了唐代的文学与文化。

第四节 唐传奇中的妓女理想化

唐传奇的作家们，主要是士子阶层的作者，喜欢在传奇小说中把妓女角色写得非常好、非常理想化。然而事实上这些描写是远远超出了她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真实记录，而是为了通过描写这种反差来表达作家们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内心矛盾。

作家们把这些娼妓的形象特征经过理想化，通常描写成特别完美的形象，比如有绝世的美貌、才华洋溢等等。就如《李娃传》、《霍小玉传》里，妓女不再是简单的风尘女子。她们被描绘成拥有容貌绝世，同时又精通琴棋书画，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的形象。同时又赋予这些娼妓高尚的品格以及情深义重的性格。她们对爱情忠贞不渝，甚至比书生士子更讲信义和道德。

妓女在唐代现实社会中虽身处底层，但在唐传奇中却往往被赋予崇高的品格与深情的个性。妓女的角色也被塑造成智慧的化身，经常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超越男性的智慧和决断力。例如《李娃传》中的李娃帮助郑生功成名就。这样，她们就从“被消费的对象”变成了美好价值观，如忠贞、智慧、才情的承载者。然而在真实的唐代社会，妓女属于“贱民”阶层，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命运大多非常悲惨，是被人轻视和玩弄的对象。但恰恰是这些现实中的底层女性，在文学中被赋予了最光辉的形象。这就强调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然就是这种反差制造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和艺术效果。

同时，这也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唐代的士子群体内心是有矛盾的。他们有着自己道德理想，他们读圣贤书，崇尚“仁义礼智信”等高标准的道德。然而现实中，他们自身也可能流连青楼，官场中更是充满了尔虞我诈、利益交换，许多士人自己的行为也未必都符合道德理想。

所以士人作家们将自己所向往的理想人格，如忠贞、纯粹、重情义 投射到了社会地位最低的妓女身上。通过赞美这些“完美”的妓女，间接地批评了现实中那些虚伪、负心、不道德的士人。比如《霍小玉传》中的负心汉李益。这样一来，塑造一个完美的底层女性，就成了讽刺同阶层男性、抒发自己道德理想的一种安全又巧妙的文学策略。

举个例子，著名的唐传奇《李娃传》就是完美的例证。李娃是长安名妓，标准的社会底层人物。但李娃文学形象却与身份有着反差。她不仅美丽，而且善良、深情、有远见、有魄力。她在男主角落魄时挽救他，督促他读书考取功名，最终帮助他成就事业，自己也被封为汧国夫人。⁹⁹一个现实中不可能有如此地位的妓女，在故事里却成为了拯救者和贤内助的完美典范，承载了善恶有报、巾帼胜过须眉等价值观。这个故事也反映了士人渴望在事业和情感上得到完美辅助的心理，以及对才子配佳人理想爱情模式的向往。

总的来说，唐传奇的喜欢把妓女写成“完美女神”，用文学与现实的身份反差，来寄托自己的道德理想，并委婉地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判。

⁹⁹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484，页 3985。

第五章 结语

本研究从科举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谈起，指出唐代科举在隋制基础上不断完善，最终成为士子入仕的核心途径。其中最受推崇的便是进士科，因其象征着社会地位的跃升和仕途的开启，被唐人誉为“登龙门”。在制度层面，唐代科举分为常选与制举两类。常选为定期举行，制举则因时设立，往往应对特殊政治或社会需求。考试科目繁多，但最终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并逐渐成为士子实现理想与获取政治地位的关键。在风气方面，唐代士子普遍推崇进士，以中第为人生最大荣耀。但真正能够中第的人数有限，多为权贵子弟，而清贫士子常因缺乏经济支持与门路而屡试不第。这导致“世族垄断”与“士子寒苦”之间的矛盾，形成进士科既神圣又残酷的社会氛围。

就士子出身而言，本章结合傅璇琮的研究，将唐代进士群体的来源归纳为七类：县吏子弟、工商业市井子弟、僧道出身者、将校家庭出身者、幕府从业者、外国籍应举者、贫寒士人。这一分类表明唐代科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门阀壁垒，使不同阶层都有机会入仕。特别是贫寒士子，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科举理想紧密相关，往往最能反映科举对社会流动的深远影响。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地域差异对科举的影响。中唐以后，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南移，江南、岭南等边地逐渐出现进士群体，打破了早期中原士子垄断的格局。这种地域扩展既推动了科举的普及，也使唐代文学呈现出多样化的风貌。

本研究也从多个层面解析了唐代士子在科举背景下的生活处境与文化生态。首先，行卷、温卷、纳卷（省卷）是士子应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士子通过将诗文作品

呈送达官显宦以博取荐引，行卷与温卷成为提升名声、对抗门第劣势的手段，而省卷则作为考试前的规定性预试，更加强调经济实用而排斥虚妄之作。这说明唐传奇多出于士人行卷、温卷之作，而非省卷之作。

其次，经济困境是士子群体的普遍压力。长安生活费用高昂，贫寒士子在长期滞留中常面临衣食不继，甚至饥寒交迫。曹邺、孙樵等文人的诗文记述揭示了这种困境，传奇中裴生等形象则折射了现实中的寒士处境。地域因素亦构成重要阻力。南方士子赴京应试需跋涉数千里，舟车劳顿，耗时半载，经济与体力代价远高于关中、河北士子。这种不平等导致仕途机会的差距，并在文学中被浪漫化为“漂泊”到“奇遇”再带“升华”的叙事模式，就如《柳毅传》所示。

面对屡试不第，士子往往陷于“困居”与“漂泊”的两难：困居者滞留长安，日渐抑郁与孤苦；漂泊者则辗转于旅途、地方士绅与亲族之间。传奇中的张生、裴生等人物，正是展现了文人面对的现实以及心理困境。

本研究也围绕唐代妓女的类别、地位、才艺与文学形象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从类别与来源来看，唐代妓女主要分为宫妓与官妓。宫妓多供天子享用，来源包括罪人之女与因姿色才艺入宫的平民女子；官妓则服务于士大夫与文人，多由买卖人口、误入风尘或罪人家小籍没而来。她们大多出身低贱，命运受制，社会身份无法自主改变。其次，从法律与社会地位来看，娼妓属于“贱民”，婚姻受律法严格限制。唐律规定乐户不得与良民自由通婚，即便个别情况可以“从良”，也必须经过官方批准。唐传奇作品如《霍小玉传》《李娃传》充分反映了这种低微地位：无论结局喜悲，妓女往往是付出者、受害者甚至牺牲者，而士子则是最终受益者。

此外，从才艺与文化影响来看，唐代妓女不仅仅是宴饮的陪衬，更是文学与艺术的传播者。她们多精通歌舞、诗文，能与文人唱和互动。典型例子如《琵琶行》中的艺妓、传奇中的霍小玉，以及现实中的薛涛，她们的艺术与才情直接推动了文学创作和审美传播，使妓女成为唐代文化繁荣的重要力量。最后，唐传奇对妓女的形象多加以理想化。作家们往往赋予她们绝世美貌、才情与高尚品格，把现实中的卑微女子塑造成忠贞、智慧、贤淑的化身。如《李娃传》中的李娃，不仅救助郑生，还辅佐其功成名就，体现了“才子佳人”模式的理想化叙事。这种处理反映了士子作者的心理矛盾：现实中流连青楼，但文学中却将妓女作为道德理想的承载者，用以寄托自身的价值追求，并批判士人阶层的虚伪与负心。

值得注意的是，唐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它确立了新的小说叙事传统与人物描写范式。通过文人妓女题材，作品往往探讨个人情感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也体现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与超越。此类创作不仅丰富了唐代文学，也为宋元明清小说的发展奠定基础。可以说，唐传奇犹如一座桥梁，连接了文学与历史，使我们得以借助故事窥见唐代社会的真实图景。

因此，对唐代科举制度与士人风气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唐传奇的文学特质与审美价值，也能深化对唐代社会文化的理解。通过分析士子出身、地域因素及其与妓女的交往，可更清晰地揭示唐传奇的双重属性，它既是文学作品，也是社会史料，既反映了文人的内心世界，也呈现了中国文化中始终关注的“才、情、命、制”的复杂关系。

总之，唐传奇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刻的社会内涵，再现了唐代士人的理想与焦虑，记载了科举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浮沉，也保存了文人与妓女之间多姿多彩的文化交往。它既是唐代文化繁荣的见证，也是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一扇

重要窗口。深入研读唐传奇，不仅能增进对唐代历史与文化的认知，也可为当代文学与社会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参考书目

专书

1.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23。
4.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香港：三联书店，1996。
6.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上海书店，1991。
7. 周祖撰等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

专书（古籍）

1. [唐]范摅，《云溪友议》，台北：广文书局，1971。
2. [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唐]李林甫等著，《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唐]孟郊，《孟东野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
5. [唐]裴庭裕著、田廷柱点校，《东观奏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
6. [五代]王定保著、陶绍清校证，《唐摭言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21。
7.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北京：中华书局，2006。
8. [后晋]刘昫著，《欽定四库全书荟要·旧唐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9. [宋]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 [宋]李昉等著,《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 宋]陆游著、李剑雄等校点,《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 [宋]欧阳修、宋祁等著,《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13. [宋]孙光宪著、朱以安、傅璇琮、周常林、戴建国等编,《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14. [宋]王谠著、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6. [宋]赵彦卫著、张国星校点,《云麓漫钞》,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7.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期刊论文

1. 苟煜,〈唐代科举制度与唐传奇的关系浅论〉,《今古文创》2024年第7期,页37-40。
2. 吴新武,〈科举源流述略及其它〉,《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页97-101。

学位论文

1. 顾宇,《唐传奇婢女妓女形象研究》,江苏: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